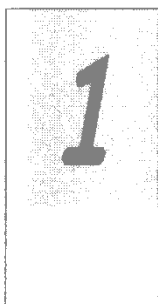


► 詹姆斯·德·代元 导言批判性探索



► James Der Derian

如今的人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需要对此术语进行争辩。

马丁·怀特：《国际理论》

就现实主义来说，人们对它的划分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影视的、文学的、法律的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卢梭（Rousseau）、黑格尔（Hegel）、韦伯（Weber）、基辛格（Kissinger）的现实主义；乐观主义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色彩的现实主义；朴素的、庸俗的、幻想的现实主义 经典的、科学的现实主义 结构的、结构理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最低纲领派的、最高纲领派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潜在主义者的现实主义 实证主义的、后实证主义的、自由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激进的、激进解释主义的现实主义 批判的、核心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最大现实主义、反映式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而且，如今在你的电脑屏幕以及超级市场的小报搁置架上，充斥的都是现实主义。

很显然，现实主义在形式上是灵活多变的，在风格上则讲究折中。然而，在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中，人们并非经常认为，现实主义

具有前后一致的、不言自明的以及显而易见的含义。甚至，在或大或小的争论中，批评家们对现实主义的历史相关性、政治功用以及启发式的价值提出了质疑。⁽¹⁾鉴于理想主义未能阻止希特勒主义 (Hitlerism) 的兴起，现实主义转而将其放弃。同时，现实主义在冷战期间两极对峙这样的困境中得到加强，并且受到学科式经院哲学的提炼。因此，现代国际关系学缺乏一种经久不息的声音 (*longue durée*，类似音乐中长元音的时值——译者注)，它仅以一种标准的“传统”形式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理论有点沉闷的时期，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确切地说，“新现实主义”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大杂烩，它拥有进步性、高度简约以及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光环。然而，在多种现实主义这样开放的背景下，对国际关系学中新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内部以及它们之间所谓的差别进行比较时，我们似乎是在进行那些无益却有些琐碎的分析，这就像人们使太多的墨水与少有的几滴象征性鲜血溢出来一样；的确，要是与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所释放的“实际的流血量”进行比较的话，那么有关这种区别的争论在学术上就显得十分令人讨厌。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其他现实主义方面的著作呢？人们可能作出的回答就是，我们对此主题的认识仍然存在隔阂，或者总是有一些新现象或事件出现，促使人们必须对现实主义的解释进行检验。在对现实主义的研究计划或者某种特别的或然性 (*problematic*) 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人们作出的这种论断是有一定依据的，并经常具有说服力。⁽²⁾但是，我并不打算重述或依靠它们。相反，就这本论文集而言，它包含了经典性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它提出挑战的批判性理论之间的对话，以此对现实主义重新进行诠释，进而使新旧理论融合在一起。⁽³⁾它标志着，与新的多极化、多元文化国际关系相适应，一种范围更广阔的多元现实主义已经到来（假如人们还没有对此接受的话）。

然而,如果我对这些原因进行排列的话,那么这本论文集的主要目的就是,对那些先驱和导师们表示敬意。这本论文集始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汉迪·布尔、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亚当·沃特森以及其他经典现实主义者最初的努力,他们从“外交探索”拓展到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等领域。⁽⁴⁾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本论文集赋予了现实主义以“不列颠”学派的特征,之所以这样称呼,而没有顾及其中那些奇怪的南非学派以及澳大利亚学派,是因为本书使人们能够接近这些学术性论文。尽管它们已经出版了较长时间,但仍然继续对这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⁵⁾在更特殊与个人的角度上,我要再次对汉迪·布尔在学术上的帮助表示感谢。

然而,从布尔那里,我学到了一种较有价值的经验,那就是自己不要过分受制于感谢,而使新的、有可能会冒一定风险的任务受到约束。因此,我采取了将批判性探索和经典性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策略,为的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天然霸权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怀疑说,如果人们没有理解在任何一篇有分量的国际关系学论文中所蕴涵的哲学以及政治学的观念,那么就无法理解现实主义的全部内涵。我的意图在于,以人们的这种怀疑为起点,重新打开关于现实主义的各种档案材料;这并不是呼吁对特定现实主义者的文章进行检查,我把这种任务留给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科卫士们。这本论文集的目的就是探索集体身份建构的方式、含义,以及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式、含义(其中,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以此来说明边缘性的理论区别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确切地说,就这些在不同时代、不同著作中的特殊思想家而言,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在整个理论光谱上广泛而又深刻的兴趣及其信仰,而这又受益于他们对历史的渊博理解。的确,小作坊的家

庭手工业迅速壮大后，它们要衡量自身的位置，如同在怀特教授作为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以及革命主义者三种思想合一的化身的内部，或者更经常地是在各种思想之间，将木钉固定在小孔里面那样。然而，从怀特在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这三种传统的演讲课程的结论来看，他对这个主题的回答证实了，思想和理论永远都不会停止，并拒绝任何将它们终止的努力：

我发现，自己的位置按照一定的周期在不停地变动。你会猜想我对理性主义有所偏见；但是，在进行这些演讲的过程中，我又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最终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具有更多的理性主义成分，而具有较少的现实主义成分了。假如我将理性主义说成是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因素，将革命主义说成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将现实主义说成国际政治中可加以控制的学科因素，那么你就有可能认为，我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是，我希望自己已经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远非如此。⁽⁶⁾

同样,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就马丁·怀特而言,在其 68 页的经典小册子《权力政治》(1946 年)写作时期与 1966 年的《外交探索》写作时期相比,他已经变得不可同日而语;就汉迪·布尔而言,在撰写《对军备竞赛的控制》(1961 年)的时期与撰写《国际关系中的正义》(1983 年)时期相比,他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好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能够成长为较优秀的格劳秀斯式的人物,也许这也仅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事实。而且,如果人们将性别的、恋母情结的解释糅合进来的话,那么批判性的探索在本质上也就成为世代相传式的,而且也许,在实践中会成为弑父式的(patricidal)。

但是,就这些思想家共同的认识以及我在本书最后一章(第

14 章) 关于理论的区分与非连续性的认识而言, 如果我们对此加以集中思考的话, 我们就会感到现实主义者这个绰号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或者, 就像马丁·怀特推测的那样: “如今的人们都是现实主义者,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不需要对此术语进行争辩。”⁽⁷⁾ 现实主义者 (以及甚至大多数的当代批评者) 接受世界政治中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权力的渗透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无政府状态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 对于这些压倒性的问题, 一些人是明确接受的, 而另一些人则是含蓄接受的; 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他们探索并能理解调停、变通的传统, 而且这些传统是由诸如格劳秀斯 (Grotius)、法特爾 (Vattel) 以及奥本海 (Oppenheim) 等国际法学家的著作提出的, 也是由奥古斯丁 (Augustine)、康德 (Kant) 以及马克思 (Marx) 等类似的世界性哲学家提出的, 但是他们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对这些传统进行重新解释的。⁽⁸⁾ 最主要的是, 他们都是哲学现实主义者, 在一定程度上坚信, 理论就是对“事物的真实面目”的反映。因此, 从一开始, 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就有助于在 (并且作为) 国际关系学的中心重新建构起现实主义的现代形式。

将国际关系理论和批判性探索放在一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每一阵营中的纯粹派都承认, 国际关系中并没有一个天然的中心, 而且在他们看来, 也许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每一方都承认, 由于对秩序的渴求和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 因此, 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以及国际机制都是在历史上建构起来的, 并经常灾难性地遭到解构。他们的区别在于, 对无政府状态而言, 人们将它视为威胁的程度不同、对维持秩序的影响不同 或者, 不那么仁慈地说, 对秩序的渴望是否会对无政府状态产生实际的效果。

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探索, 其目的并不是要解决这些区分问题。充其量, 这种对话形式有助于我们对这些差别的模糊

性、自相矛盾性以及偶尔的敌对进行交流协商,而这些差别时时显得难以调和,甚至无法估量。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这一对话是其最早的硬币中具有决定性的两个方面。就像守门的两面神(Janus, 罗马传说的一种神——译者注)那样,国际关系学的注视(gaze)具有前瞻后顾性,人们以这种理所当然(然而,具有致命性破坏力的)的声望来维护国际关系理论,仅仅承认能够证实其解释力的那部分历史。就像理想型的外交家一样,国际关系理论赞赏妥协和综合的优点,并且将灾难深藏于两极对抗之中,以这种艺术性的欺骗掩盖了调解的目的。就像实际的政治家一样,国际关系理论提炼得更加坚固,因为马基雅维利式的优点掺杂了格劳秀斯关于秩序的修辞学(在实证以及建构意义上的),以此建立了理性交往、制度性合作以及司法调解。

但是,批判性探索的最大阻碍在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主义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里,怀特早期的和平主义作为思考的例外),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现实主义维持其价值观作为国际关系的通用原则,因为它丝毫不动摇国际关系与暴力之间关系的“天然地位”。就像国际关系理论所做的那样,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对世界政治的反映,而不将它作为世界政治的建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接受现实主义,就是要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其中包括必然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至少是英国早期无政府状态的形式)邪恶、永久的异化和对以武力反对武力的认可、对权力的普遍愿望(引诱政治家和期望要成为政治家的顾问们去夺取王位)。结果,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沿着不受道德约束的轨迹发展,而导致滑向宿命论、教条主义以及愤世嫉俗主义。

现在,所有的政治家和学者们都能面临一个需要进行充分论证的问题,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探索所产生的新生代理论是否比过去要“好得多”?在第2章一开始,马丁·怀特提出的

“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这一引发争论的学术问题,就预见到了上面这个首当其冲的问题。这个标题表达了他的观点,即由于缺少一种使政治理论的产生变为可能的主权以及国内秩序,所以国际关系理论处于一种循环重复的尴尬局面。⁽⁹⁾因此,《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这篇文章早期的一份草稿所用的标题)的用意肯定是对这种野蛮状态的本性进行解释,这种野蛮状态的本性所蕴涵的特征包括:非进步性、非累积性以及命中注定的推测性。⁽¹⁰⁾

如果批判性探索有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 30 年来对怀特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回应的一种尝试。批判性探索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通过建立一系列三方对话的形式,以及向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表示歉意,维护英式语言的地位,这种探索的确是在创造机会以使这种学问式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应当承认,与汉迪·布尔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经典性方法的辩论性保护相比,或者与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为新现实主义陷入历史性错误的泥潭而大声疾呼相比,三方对话的方式要逊色得多。⁽¹¹⁾然而,这种三方对话形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权威回答或基本命运保持同等距离,这使我们能真实地感觉到,我们到底已经达到怎样的高度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

换句话说,这种探索并不像直线那样直接导向现实主义的正确性,或者沿着能够为世界政治问题提供标准解决办法的路线前进。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它提供了一种三角关系,并且已经转移到了国外的未知区域。我希望,这种探索能够提供一种评价、理解进步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有些人希望保持的那种线性方式或类似性比较,而是进步与构成世界政治的差异(以及非连续性、偶然性)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也许就能从世界建构的道德伦理的角度对现实主义进行全新的判断,而不是从其理论反映的正确性的

角度作出判断。

这种情形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部分得到了证实，收在这本论文集的其中两章(第 2 章和第 5 章)是由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写的，分别作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开始。这些文章是不列颠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早期交流的结果。这个组织是由一小部分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外交家组成的，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探讨的是 25 年间(1959—1984 年)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¹²⁾。1966 年，该委员会将一些早期的论文以《外交探索》为题整理成书并且交付出版，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是由巴特菲尔德和怀特主编的。《外交探索》的前两篇文章分别是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和布尔的《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国际理论的经典传统就是一种历史性调查、哲学思考以及规范性（经常是法律上的）理论的联合，这两篇文章早期就对这一传统的许多信条进行了超越。这些文章以世界政治中的关键性问题作为起点，将本书划分为几个主要部分：理论与传统、无政府状态与主权、学科与权力、理性与历史。⁽¹³⁾

怀特和布尔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经典性思想的基础，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思考、自我反思的态度，能考虑到人们进行补充阅读的需要。在这些文章中，并没有什么值得吝啬或故弄玄虚的地方。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行为主义倾向的出现，美国国际关系学有一种“抽象的”“非历史性的”以及“非政治性的”特性，与此相对应，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写了一篇有关怀特的评论性文章《理论的理性和政治功能》，以此对国际关系学的这种特征提出尖锐的批评。其结果是，摩根索本人从伦理道德方面对政治现实主义进行了超乎寻常的维护。同样，J. 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也能借助摩根索开出的道德—政治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主义进行批判、挑战并作出补充（第

4 章)；这一批判揭示了，在政治现实主义的性别以及社会建构原则中，存在着具有决定作用的非普遍化、非客观化的性质。

他们对理论和传统的主要关注和建构，构成了与当代的思想批评家进行对话的起点。日趋明显的是，在这些当代思想家中，一部分人对经典现实主义进行拯救和重释，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加以否定和拒绝。然而，他们都尊重现实主义用以观察世界问题的权力及其愿望。用理查德·阿什利的话说，“在多元文化的可能性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永无休止、充满危险的争论，而现代文化在国内的遭遇仅仅是这种可能性之一”⁽¹⁴⁾。在第 6 章，阿什利认真思考了布尔提出的观点；他返回到“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以及人们所强加的“国内类比”这一权威式的神话等话题，然后把它推翻了。在第 7 章，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t)为无政府状态这一或然性在大西洋两岸的交流提供了北美这个平台，他质问了当代所有的争论焦点，其中包括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反映主义、现代与后现代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并极其努力地提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这一富有具体内容的挑战。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第 8 章至第 10 章)，这些思想火花继续体现在汉迪·布尔、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海沃德·阿尔克(Hayward Alker)、托马斯·比尔斯特克(Thomas Biersteker)等人关于国际关系学中权力和国家这些主题的一系列文章中。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并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持久性进行了社会学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这些文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对这个领域的广泛理解，而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各种历史性挑战(诸如出现的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析。这些学者很早就对这门学科成长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刻思考，已经达到了足以对这门学科的现状进行评价的高度，并且有一定的设

想和勇气告诉我们，要想使这门学科变得比过去更好，该是多么困难。

在第四部分《理性与历史》中，虽然接下来的主题是学科上的实践和压力究竟如何形成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探索，但是该部分使争论继续向前推进，以至于包括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伦理学这些新近出现的重要问题。在第 11 章，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倡导，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去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以及实现进步，同时，也承认，逐渐兴起的这种“反映主义”方法能够迅速地对别人提出批评，而在发展自身的研究计划方面却停滞不前。尽管罗布·沃尔克（Rob Walker）对基欧汉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回应，但是他继续讨论的却是道德与政治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克所讨论的道德与政治问题是随着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被引入国际关系理论而出现的。在第 13 章，琼·贝思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将正受到人们忽视的本体论因素提到议程上来，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且，将其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破坏力量，介入到国际关系学有关理性与平等、权力与主权以及暴力与正义的主要争论之中。

这场争论包括有关现实主义的后结构主义问题。后结构主义问题曾经在国际关系学中受到忽视，我认为，这对国际关系理论不利。鉴于此，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第 14 章），并不是这场争论的结束，而是这场争论的重新开始。

总之，就这本论文集的目的而言，它并不是要解决某些问题、综合对立的观点或者做到百花齐放（就像实证主义的、辩证的或折中的方法可能推进的那样），而是通过批判性解释的对话形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及其遗产进行重新探索。至于这是否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有非中心化、解构的或仅仅是一种非革命化的倾向，那就留给读者来进行决定了。

我本应该对此留有余地,但是,我对客观性以及职业化名义下的通常含义又不能保持沉默。很明显,就我对这些论文的选择而言,它反映了我所接受的训练、知识态度以及政治信仰。然而,我首先认为,只有当权威的声音同其他格格不入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国际关系理论才有可能取得进展。一些人有可能把它视为对完美结局的破坏,而另外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新知识门类的伤疤。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经说过,“从人类错综复杂的本性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条不紊的事情”然而,对那些更喜欢国际关系理论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的人来说,我用艾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对这句话的错误引用(而且,它需要做出诸多说明的隐喻)⁽¹⁵⁾来结束这篇导言。

注 释

(1) 关于这场争论一些较为著名的标志性著作,包括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s, 1932);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H.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April 1966). pp. 361—377; J. David Singer, “The Incomplete Theorist: Insight Without Evidence,”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63—86。

就促进现实主义实现巨大发展的 (seminal) 人物来说,有两种相关的叙述性评论提出了比大部分分析性说明都多的见解: Michael J.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el H. Rosenthal, *Righteous Realists : Political Realism, Responsible Power,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Nuclear Ag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对“后现实主义”观点的广泛范围而言，可以参见 Richard Ashley, “Political realism and human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25, pp. 204—236;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84), pp. 225—286; R. B. J. Walker, “Realism,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March 1987), pp. 65—86; Anders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J. 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Minneapolis, M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ger Epp, *Power Politics and the Civitas Terrena: The Augustinian Sources of Anglo-American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D. dissertation (Kingston, Ontario: Queen’s University, June 1990); Costas Constantinou, “Theorias: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Diplomacy,” Ph.D. dissertation (Lancaster, England: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1993)。

(2) 关于内部批评的事例，可以参见 Robert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pp. 1—26;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现实主义不能解释、更无法预测冷战的结束，而且，它轻率地拒绝对自己缺乏了解的意义进行评价；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见 Richard Falk’s review of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2) (June 1993), pp. 544—545。

(3) 根据怀特与布尔所作的演讲，对那些只有概念界定明确才能取得进展的人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是“一些主导性的思想始终支配着我们对国际关系学或世界政治学的看法……与过去及现在的实践有关，我们如何把这些思想与它们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又如何来检验它们的正确性

及它们与我们当前的政治利害的关系，也受这些思想支配”。参见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eds.)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 Hedley Bull, lecture not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8—1789。

(4) 参见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一些人在探求这一派别内部以及在构成这一派别的个人内部的相关特征及差异，对他们来说，我推荐 J. D. B. Miller 与 R. J. Vincent 主编的论文集，*Order and Violence: 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5) 关于导言所回避的“元问题”，包括它的缺陷、长处甚至是国际关系学中是否存在不列颠学派，可以参见 Roy E.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7 (1981), pp. 1—12; Hidemi Suganami,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ism: an anatomy of British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 (1983); Sheila Grader,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and evalu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1988), pp. 29—44; N. J. Rengger, “Serpents and Doves in Class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2) (Summer 1988) . pp. 215—226; the Special Issue on “Beyo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 (3) (Winter 1992)。

(6)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eds.)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68.

(7)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p.15.

(8) 关于现实主义的哲学含义，参见第 14 章。

(9) 参见这本论文集的第 2 章中 Martin Wight 所写的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15—35。

(10) 这反映了 Hedley Bull 在他所写的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1976), pp. 101—116 中的解释 这篇文章在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pp. 9—23 中得以重印。

(11) 参见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and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我的发现是对反对辩论术进行对话的最好的、最雄辩的辩护, 参见 Foucault, “Polemics, Politics, Problemizations,” *The Foucault Reader*, Paul Rabinow (ed.)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p. 381—383。

(12) 关于对大不列颠委员会 (British Committee) 的研究所进行的探讨及其继续, 参见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1976) 以及他为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Hedley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所写的导言;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e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oger Epp, “Power Politics and the Civitas Terrena: The Augustinian Sources of Anglo-American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 关于国际关系学中的传统的形成, 参见 James Der Derian, “Introducing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2) (Summer 1988), pp. 189—193。

(14) Richard Ashley's Chapter 6, “The Powers of Anarchy: Theory, Sovereignty,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Global Life”, p. 98

(15)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ew York: Vintage, 1992), p. 7.

第一部分

理论与传统

► 马丁·怀特

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1966 年)*

2

► Martin Wight

对于“政治理论”这个术语，一般不需要作什么解释。在这里，我用它来表示对国家的有关思考，这是从柏拉图（Plato）以来就有的传统含义。另一方面，对于“国际理论”这个术语，又的确需要人们作出说明。乍一听起来，人们有可能将“国际理论”的含义理解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或者理解为一些对国际现象做出前后一致解释的概念体系（也就是，“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上述两种含义的任何一种都不是我所指的“国际理论”。“国际理论”意指一种思考国家间关系的传统，也意指人们设想出来的一种对“政治理论”研究下的国家进行双重思考的传统。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理论一开始就不存在。

当然，人们需要进行一些区分。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著作有许多种；其中，不乏享有类似马基雅维利或康德的作品那样有杰出声誉的著作而且，这类作品在 20 世纪就已经开始时兴起来。⁽¹⁾然而，其中任何一本著作都很难具有政治经典作品的地位。有一类问题的确困扰着讲授国际关系学的教师们，因为他们把国际关系学视为双重主题，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与人们普遍熟知的政治学

* H. Butterfield and M.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p. 17—34.